

16.00 /

巩义市文史资料

第九辑

9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巩义市委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1991年12月

巩义市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河南省人民政府文件

豫政（1991）77号 签发人：胡悌云

关于撤销巩县设立巩义市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各地区行政公署，省政府各部门：

接民政部民行批（1991）13号批复，国务院批准撤销我省巩县，设立巩义市（县级）。以原巩县的行政区域为巩义市的行政区域，不增加机构和编制。据此，省政府决定，巩县改为巩义市后，委托郑州市代管。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

编者的话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巩县设立巩义市的 通知”的精神，《巩县文史资料》改为《巩义市文史资料》，其辑数顺延，并继续向各界人士征稿。其内容除解放前的资料继续收集外，今明两年重点征集五十年代前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失误和教训。请您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为特征，撰写第一手资料。观点不强求统一，但一定要“求实存真”。用我们的切身经历，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

目 录

建国后史料

回郭镇解放琐忆……………熊安良（1）

正确对待历史

——巩县工作纪实之二……………张铁弓（19）

刻苦学习 锐意进取

——巩县工作纪实之三……………张铁弓（28）

巩县中学文工团……………王永顺（35）

巩县三中接待美国广播公司采访记……………路俊杰（38）

巩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突破

——铁生沟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掘…崔耕（46）

从军十三年……………任旭利（54）

壮心不已 余热生辉

——记离休妇产科医师孟隐芳同志 冯书灿（62）

平凡的经历 深沉的回忆……………张虚（66）

建国前史料

赵法烈士的牺牲……………赵青钧口述 崔振普整理（77）

杏槐伤疤

——日伪在大峪沟钟岭的暴行……………

王廷芳口述 崔振普整理（83）

赵万川烈士事迹……………崔振普（85）

张仲鲁先生二三事.....	马元先 (88)
刘村办学记.....	刘延昌 (90)
仓西小学的兴办.....	李建仁 (91)
旧社会的三教九流和江湖语.....	刘庆昭 (98)
白云寺的兴衰.....	张国瑞 (105)
我所说的明清时代科举制度.....	白凤楼 (108)
闻名中州的开封福豫公司.....	刘庆昭 张承忠 (116)
我所了解的巩县旧邮政.....	武盘石 (124)
刘镇华、刘茂恩为其母祝寿实况... 刘庆昭	张承忠 (131)
赵维黄请客.....	刘庆昭 (138)
李和卿之死.....	刘庆昭 张承忠 (141)
蒋介石视察巩县兵工厂目睹记.....	孙一民 (144)
国民党航空驱逐队的建立.....	康永奇 (146)

建议·补充·改正

来函照登.....	孟昭英 (149)
对《巩县文史资料》第七辑史料的补正.....	刘庆昭 (152)
声明.....	崔振普 (154)
关于卷席筒原作者的说明.....	周克远 (155)
对《巩县文史资料》第七、八辑的改错胡其卿崔南星	(156)

回郭镇解放琐忆

熊安良

1948年4月上旬的一天，解放回郭镇的枪声停止不久，石印馆掌柜李瑞芳风风火火跑到我家，喘着粗气对我说：“有人找你。”我问：“是谁？”他递给我一张巴掌大的纸条说：“你看是谁。”我接过来一看，上写：“安良同志，有要事相商，请速来黑石关李克让家一叙。徐宝森。”我顿觉浑身血液一下子沸腾起来。送走李瑞芳，吃了点东西就直奔黑石关。

我于1939年3月参加巩县地下党时，徐宝森是中共巩县县委组织委员，1942年，他奉命撤出豫西，这次是奉命回巩县开辟新区的。他派邵方给我送信，因李瑞芳知道我家，邵让李把条子送给我，邵、李二人都是我们搞地下工作时联系的积极分子。

走到目的地，才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这是巩县人民民主政府县长，就是徐宝森。我扫视了一下环境：小小院落几间旧瓦房，寥寥几个身穿便服的工作人员，极为简单的锅灶，铁锅里正煮着汤面条——这就是即将在巩县掀起一场翻天覆地大变革的最高首脑机关的一切。

这天夜里，我和徐宝森整整谈到天明。自1942年党从豫西撤退开始，较详细地谈了我和贾书斋的全部行踪、工作、生活及思想情况。谈话是断断续续进行的，有时他要问我一些问题，还没等我回答，别人又把他叫走处理问题了。谈到

天将明时，他要我作两种思想准备：一是到黄河北巩县办事处；一是在回郭镇作开辟新区工作。

第二天早饭后，徐宝森同我一道到回郭镇找到“九纵”民运部郭部长。郭极其热情而亲切地同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让我在家里听候通知。

两天后，我收集一些情况去找郭部长汇报时，一进屋就听到一个战士正说着我的名字，桌子的另一端郭部长低着头正记着笔记。我立即明白这是正在谈我，想要退出来时被郭部长叫住了。（以后得知，在宣布我当区长以前，郭部长曾派以晏新文为队长的“民运部工作队”全体出动，在回郭镇及附近各村对我进行了全面了解。）这天傍晚，郭部长领着我和徐宝森到“九纵”司令部见了秦基伟司令员，他们正在开会，郭部长介绍后，秦司令员和另外两位首长很客气地让座倒茶，才简单问了几句话，只见又一位首长手里握着马鞭、风尘仆仆走进屋来，郭部长遂带着我们退出。

1948年4月15日，在回郭镇街中心的“天爷庙”，郭部长主持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他先介绍了巩县人民民主政府县长徐宝森，徐又宣布我是共产党员，并任命我为第四区（回郭镇区）区长。对回郭镇地区来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从今天起，广大农民就永远结束了衣食无着的贫苦生活，彻底改变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

回郭镇，因其交通便利之便，在历史上就是周围各县一个物资集散中心，也是豪绅势力集中之地。40年代前后，由于卷烟、织布业的崛起，逐渐发展成为豫西农村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工商业区，在其鼎盛时期，因外地客商云集，市场空

前活跃，一度曾有“小上海”之称。因此它也受到国民党官僚、地主、资本家的格外青睐。表面上他们也拿出几个钱来“投资办厂”，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其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设置有政务、商务、警务、税务等机构。通过其形形色色的爪牙走狗，日甚一日地对贫苦民众进行残酷盘剥和压迫。

正所谓“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这人祸横流的年代，又来了个1942年的特大天灾。直搞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穷人家有男子的卖了“壮丁”，去替富家子弟卖命了。卖儿鬻女、自卖自身的随处可见。富豪人家趁机巧取豪夺，以低廉的代价兼并庄田牲畜以及长女少妇，如20斤麦子可买一亩良田。广大农民则以榆皮，雁屎为食。

那时，我在卢医庙小学教书，因终日腹中空空，每天从家里（镇南桃园沟）到学校的三华里途中，需休息两次才能走到。有一次我眼巴巴看着一个挎着菜篮儿在地边上蹒跚行走的中年妇女，一头栽到河沟里起不来。我用尽气力想把她搀起来，但怎么也搀不动，四周又空无一人，只好怀着深深的歉疚走开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面对如此惨象而无能为力，至今想起犹有极其沉重的负罪感。如果说十里洋场“旧上海”是富人的天堂、贫民的地狱的话，称回郭镇是“小上海”倒是十分恰当的比喻。

回想起来，那时如果党不从豫西撤走的话，肯定无疑地会把广大饥民组织起来，开展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但由于当时形势极端严峻，日蒋汪加紧勾结，连续发动反共高潮，党中央从长远出发，从全局着眼，果断地作出了“隐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决策。奉中央之命，豫

西党的各级干部，包括王桂五、徐宝森在内，有的去延安了，有的转移隐蔽了。对我们这些留下隐蔽自谋职业的党员，都进行了严格的气节和纪律教育，并命令停止一切活动。对一些政治观念模糊者，则停止了联系。1942年王桂五秘密回巩，我要求跟他一起走时，他又重申了中央决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给我定了个“安”字联络记号，并安慰我说：“你不管走到哪里，党都会找到你，早晚有姓‘安’的找你，你就可跟他去找组织了。”从此，这个姓“安”的就成为我的精神支柱。特别是家乡沦陷，我和贾书斋撤往陕西后，我没一天不在轻轻叫着，或在地上一次次地划着：“姓安的，你在哪里呢？”

现在党真的回来了。但不是所谓姓“安”的，而是堂堂正正的党组织，党的军队，党的人民政府。党又委以重任，让我当回郭区的一区之长，对我本人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回郭镇是生我养我之地，这块土地上除了有我的父母兄弟骨肉至亲外，还有我许多同窗好友，总角之交。这块土地曾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幸福和憧憬，给了我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然而这块土地也给了我贫困和饥饿，使我也常有类似韩信寄食漂母、受辱胯下的屈辱激愤心态。尤其令我苦恼的是，在这块土地上虽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委员会，我又作了支部书记，但在那苦难的年代，眼睁睁看着父老乡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却爱莫能助。

现在我当了共产党的区长，全区几万双眼睛几乎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如何行动，尤其是我的亲人和仇人，我应当

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呢？

这一切的一切，确确实实把我推向了忘掉自我的境界，把我的整个身心凝聚成一个字：“干”！在此后的若干年中，我每天都嫌天黑得太早，都在隐隐约约地生出一种可笑的愿望：谁能发明一种神力，把一天再拉长十个小时才好哩！

但从那时说，自己除了从书本上学到一点革命理论外，仅有的社会实践不过是一点环境调查，和联系青年准备迎接革命高潮而已。现在高潮来了，其势又汹涌磅礴，激励你非干不可。然而究竟怎样干？老实说自己实在是个大白丁，什么也不懂！所幸，比之其它区，我有个得天独厚的好条件：“九纵”首脑机关就驻在回郭镇。要不是有个“九纵”，有个“民运部”做我的坚强后盾，说实在的我是寸步难行。

那时，县委尚未成立，县人民政府只县长一人，因“九纵”在回郭镇，徐宝森把他的精力和时间主要用于一区和二区（其它各区尚属空白）。应当说回郭区的开辟工作基本上是在“九纵”直接领导下开始的。

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虽然已发生了很大的、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尚未开始，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还在各个战场疯狂反扑。毛主席对整个战局的估计是：再打一年左右，敌我力量可基本平衡（《关于情况的通报》大意）。郭部长在一次传达文件时曾这样讲：“毛主席说，我们还必须作好思想准备，退到延安，退到井冈山，重新打游击。”

就回郭区讲，虽有“九纵”坐镇，周围形势也相当严峻：除了南山一带有巩县国民党地方武装在伺机骚扰外，

王殿臣为首的土匪武装还极为猖獗，回郭镇周围不时传来的夜半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就是他们干的。针对他们的行为，我们以区政府的名义到处张贴布告，宣讲政策，严重警告敌人不得捣乱。王殿臣则派其黑干将任秀山几次潜入区政府行刺，因我们采取了机动灵活的防范措施，使其未能得逞。但其贼心不死，在东侯村杀死了我们一个姓杨的区干部。

尤其严重的是，盘踞关中的胡宗南曾两次集重兵于潼关，并疯狂叫嚣“坚决打通陇海线”。郑州敌人也蠢蠢欲动，企图由东而西出师策应。这时我们也两度接到紧急战备命令，要我们立即做好两种准备：一是随大军转移，一是上山打游击。每次我们都把去留人员进行了清理排队（少部分人因各种顾虑不愿跟着走），存粮进行了疏散（赈济），马背上了鞍，枪扛上了肩，排好队伍等待出发命令。但两次都是在武装待发之际，又接到解除战备令而停了下来。后来知道是其它战场的节节胜利，对东西两线敌军进行了有效牵制的结果。

处在上述狂风急浪、险象迭生情况下的回郭镇，谣言四起，富人外逃，人心惶惶，百业俱废。开辟新区的工作更加困难，我只有依靠“九纵”的领导和支持，团结进步群众开展工作。

我从小学、中学到踏上社会，先后有过三次“金兰”之谊，共有十四、五人，前两次年龄小，无所谓。最后一次，则是在党号召共产党员要广交朋友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另外，1940年前后，在党的领导下，在我家组建了一个以集资办手工卷烟场为公开形式的“抗日经济后援会”。几乎每天夜里

都有几个青年到我家来，以闲聊形式共同学习时事政治，有时也聊一些社会发展史方面的常识。这个组织也联系一部分人，同前者加起来，不下三十人。他们年龄都比我大，都有文化，分布在各行各业，在各自所处的环境中，不同程度地对我有一些影响。其中，王凌云（经我介绍入党，豫西党撤走后停止联系）、王延炎、王明训、王连宗、王景东、王殿超、邵元吉、邵元和、邵心泰、冯福、李瑞芳、阎根上、阎孟林等人，早已程度不同的有了进步思想倾向。这时，一部分毅然挺身而出参加工作了，另一部分因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顾虑，不敢出来工作。他们对我讲：“我暂时不出来，可不是怕共产党，我是怕国民党来了给家庭招大祸呀！”但在宣传党的政策方面，他们大都是积极分子。也有个别人先是有顾虑，一旦顾虑解除后，就成了稳定市场、安定民心的中坚分子。如卷烟界有很大影响的“西北烟厂”经理王明训，他原本是我以前经常联系，并有进步思想倾向的青年，后来办烟厂发了大财，他的顾虑全是因“发财”而产生的。回郭镇一解放，他立即躲到了乡下准备转移财物，安排外逃。群众大会后，冯福（西北烟厂店员，也是我常联系的一个教育对象）去告诉了他。他派冯福和我接了头，当天夜里秘密来到我家谈了一夜话。第二天公开露面做起开工准备。大约五、六天光景，就率先恢复了生产和经营。

“西北烟厂”的复工开业，不仅带动了卷烟界，甚至对整个回郭镇工商业的复工开业，都起了推动和带头作用。众所周知，解放初期一个阶段，回郭镇之所以能够担负起一个专区的大部分财政开支。我认为“西北烟厂”是有着一份功劳

的。

随后在接连进行的扩军、建政、收缴枪支、戒烟戒毒、会道门登记、贯彻工商业政策、号召逃亡分子归乡、向各类新办干校、训练班输送学员等工作中，上述这批人，大都是积极的义务宣传员，有的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如登记枪支时，拿上自己的护家枪支，向有枪者作现身说法。号召返乡时，主动给自己和别人的外逃亲友写信等），还有个别人一听到匪情，就给我报信，使我们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暗杀阴谋。

回顾这段历史，使我深深感到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尤其在新区，它就象人与空气一样不可须臾离缺。

不知是否出自郭部长的授意，或民运部工作队的发动，在集市秩序逐步稳定之后，社会上悄悄掀起一股“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涟漪来。起初规模很小，只是个别并不涉及豪门权贵的民事纠纷而到区政府告状，为了体现党和政府“为民作主”之意，我们专设个民政干事，从事这类案件的调解工作。谁知这消息传播极快，没几天，大批“申冤大状”送来了。还有个别人仿效戏台上的模样，跪在区政府门口大呼“冤枉”，弄得观者如堵。交通为之阻塞。经和郭部长研究，干脆贴出告示：某月某日，在罗庄奶奶庙开庭办案，凡有冤情者届时去那里申诉。

告示一出，我家里也热闹起来，每天晚上都有亲友们来找我，不过多不是替谁说情，而是关心和告诫：“某某人的事情是这样的，你可莫上当。”“某某的事是这样的，你可要替人家作主。”我干爹马贵跑到我家极其神秘

地对我说：“良啊。我来找你可不是替谁讲情哩，要那样，干爹就是害你，我是要暗里帮你，叫你成为断案如神的包青天。×××和×××的事，里面的曲弯多着哩……”

到了这天，民政干事坚持要我参加，我想请郭部长去，他不去，这样我就成了当然的“主任审判员”。

天哪！别说那时还没有各种诉讼法，就是有，我也没时间学习。但既被现实推上了审判席，那就硬着头皮干吧。

法官断案效率高，一个上午和一个下午，大约断了十个左右案子，

其实无非根据郭部长的启示，通过“断案”让新区人民知道共产党是替穷人打天下的。宣传劳动光荣，剥削有罪，对受欺凌、受剥削的穷人作些安抚工作，对仗仗财势欺压人的富户作些批评教育。行为特别恶劣的除了严加申斥外，命他老实守法听候处理，如敢打击报复或畏罪潜逃则罪加一等。

作为地方政府，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千方百计保证大军对军粮和兵源的需求。所以我只断了一天案就又投入了建政、扩军等中心工作，而把“断案”和机关事务全委托给阎根上和阎孟林了。没想到我只当了一天的“法官”，却惊动了一位在回郭镇赫赫有名的大财主赵某。据说从群众大会那天开始，他就心惊胆颤起来，到贴出“申冤告示”后，他就惶惶不可终日了。

提起赵某，还得把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来作一次瞬息掠影。我家座落在回郭镇街中心，是一座浑砖到顶的老宅院，系民国初年经我父亲建造，可以说一砖一瓦都倾注着他无限

心血。20年代末分家时，我父亲含着眼泪，满怀深情地对我两个堂兄说：“这个宅院分给你两人住吧，这是我对你们死去父亲的安慰和怀念，你们只要好好经管就算对起我了。”（我大伯、三叔死得早，不但盖此宅时不曾添砖加瓦，就连我两个堂兄，也是由我父亲养大，并为之完婚成家的。我大堂兄脑子缺根弦，是个“弱智儿”，二堂兄也是老实到见人不说一句话。因此我父亲才决心这样做）。随后父亲就带着母亲、我和小弟搬进只有两间土屋的牲口院。

老宅的毗邻就是大暴发户赵某的日杂商店。赵常到我家串门，对我家情况十分熟悉，并对此宅早萌觊觎之念。他见我父亲把它分给了唯岳母之命是从的“没用”的年轻人，立即施展其扩张者惯用的“黄鼠狼给鸡拜年”那套伎俩来，经常主动地给我两个堂兄以各种方便。但知我父亲视此宅若生命，起初尚不敢彰明昭著地干。后来我父亲患了半身不遂，家计日渐艰窘，他就开始放胆进攻了。随着父亲病情逐渐加重，赵某的“战略攻势”也跟着肆无忌惮起来，对我两个堂兄随时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是有求必应。从借给牲口车辆到大把大把借给钞票，而且唯恐其少，甚至闻风而动，“送货上门”。我父亲听到些口风，把我两个堂兄找来教训责骂了两次，反倒招致他们更大的不满，使他们对赵某益发感激，索性都躲到岳母家里再不露面了。就这样，父亲病情的日益加剧和赵某攻势的愈来愈狂。竟成了互为影响，恶性循环的“双轨效应”，很快就把事情推到顶峰。赵某向大哥、二哥讨债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房产交易正式出台了。“成交”以前，依据“卖庄卖地，先紧自己”的乡俗，赵某让

人带着成交文书草稿，到我父亲病榻前征求意见。这时父亲贫病交加，已到了无力求医，粮不继日的地步，哪能与赵某这样拥有雄厚实力的资本家竞购房产！实际上赵某送来的是一张“追命符”。我父亲连话也不会说了，一下子病情垂危了。可怜我父亲在奄奄一息之时，还幻想着用自己的弥留之躯，去阻止这场房产交易。他不顾亲属们再三规劝，半夜三更让人用门板把他抬到业已改名换姓的老宅院，妄图以此来唤醒两个不肖子侄的良知，来感动赵某大发慈悲，把吞入口中的猎物吐出来。然而赵某吐出的却是恶言秽语：“快死了还来讹人！”赵某当即命人把我父亲强行驱逐到大门以外的街上。时值隆冬天气，不大一会儿，父亲就连冻带气僵死在凛冽北风之中了。

发生这些事时，我正在甘肃国立十中求学，上述经过是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回到家中才知道的。我虽未亲眼目睹父亲惨死的情形，未亲耳听到这场罕见“新闻”所引发的轰动性议论，但在我一颗年轻（时15岁）心灵上所激起的巨大波澜，那是任何文字也无法表达的。当时我如果有枪，我会立即跑去寻杀仇人，如果有力就会去拼命，如果有钱定会去告状。我虽然搞不清当事各方都应受到怎样的法律认定，但是我认定直接致我父于死地的是赵某，将使我终生蒙受耻辱的是赵某。可惜我一无所有，我只能在夜深人静时仰面大呼：如此的杀父之仇，如此的奇耻大辱，如果今生不能洗雪，我将何以为人！

然而我的荣辱史并未就此结束，如果赵某的行为还可称作“巧取豪夺”的话，那末不久以后比赵某名气更大的两个恶

霸马某和王某的行为就完全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了。不过这两次所涉物体仅是若干石器、元木及一段荒坡的走路权，其规模和价值比前者小的多。但受到我的抵抗后，他们对我施加的当众羞辱，则比前者更加蛮横和卑鄙。

我家本是单门独户，加上人丁不旺，势单力薄，在那“衙门有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世道中，除了有泪肚里咽，有气就饭吃，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呢？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切屈辱使我清醒地认识了旧社会的阶级实质，恰恰成了我较为容易接受革命真理，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的强大动力。也就在这一年，经贾书斋介绍，我被王桂五同志接受为中共地下党员。

自群众大会上我受命当了区长，尤其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浪潮由小到大掀起后，凡知道我的羞辱家史的人（回郭镇大多数人都知道），无不在盯着我，都以为我必然有所行动。尤其直接施暴于我的“三大仇家”，更是忧心忡忡，不知所措。我在罗庄“断案”后，赵某就屡屡托人找我母亲赔罪，甚至他本人亲自给我母亲下跪讨饶，声言情愿将老宅“完璧归赵”。马、王两家也都采取了类似行动。

说心里话，我当时未尝不想讨回庄院、石器、木料，也想给他们一点颜色。并不是为了这些物资，主要是想扬扬眉，吐吐气，报报“一箭之仇”。然而我对自己所处地位——一身系党在一个区范围内的政策代表，这点是清醒的。因此虽然几经考虑反复斗争，也曾几次想找郭部长倾诉冤情，并请教一下：“假若我不是区长，而是一般蒙冤群众该如何？”的道理，但却强忍住了，最终还是遵照共产党、解放军“不图私